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8 日)

1、约瑟夫·奈分析拜登时代的美国是否值得信任

12 月 4 日，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了哈佛大学杰出服务荣休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评论文章《拜登时代的美国值得信任吗？》。奈认为，因为特朗普总统臭名昭著的谎言，美国的伙伴和盟友们已开始不再信任美国，美国的软实力急剧下降。从短期来看，拜登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主张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以及他对北约的承诺，或许能立竿见影地重构盟友的信任，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但是，拜登仍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信任危机——盟友们注意到了美国政党政治严重的极化现象，质疑美式民主是否正在衰落，美国是否还值得信任。幸运的是，美国宪法在外交政策方面比在国内政策方面为总统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短期内的合作改善将是可以实现。“盟友能否信任美国不再出现另一个特朗普”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尚无法得到完全肯定的回答，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的程度，以及拜登处理美国国家政治极化问题时的政治技巧。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an-joe-biden-restore-trust-in-america-by-joseph-s-nye-2020-12>

2、《国家利益》刊文分析拜登无法摆脱美国永久战争的原因

12月5日,《国家利益》杂志官网刊登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保罗·皮拉尔(Paul R. Pillar)撰写的文章《为何拜登无法摆脱美国永无休止的战争》。文章认为,拜登执政期间民主党内部最有可能出现的外交政策分歧在于,如何迅速使美国摆脱永无休止的战争。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大力削减美国海外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但如果操之过急,将会与前任政府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和损害结合造成更加复杂的影响;二是,缩减海外军事行动的方式和速度将会影响美国利益,尤其是在冲突地区;三是,拜登的政治资本有限,与军事缩减相比,控制疫情等必要事务会更具高度优先性;四是,拜登对海外军事行动的政治言论易成为政治竞争者的议题,如其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的分歧。因此,文章认为,拜登希望缩减海外军事行动还需要考虑其他优先事项、限制因素和政治事实。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paul-pillar/why-joe-biden-won't-be-free-america's-forever-wars-173829>

3、《阿米蒂奇-奈报告》：2020年的美日同盟

12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哈佛大学杰出服务荣休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等人撰写的系列报告新篇:《2020年的美日同盟:关注全球议程的平等同盟》。报告对2020年美日同盟的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面对不断涌现的全球问题与全新地缘政治挑战,随着东亚各国实力

的动态变化，如果还称不上领导地位，日本在两国同盟中至少可谓首次扮演了与美国平等的角色，在制定地区议程、支持自由贸易与多边合作、维护与塑造地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主动性可归因于两方面：一，日本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二，特朗普政府前后矛盾的对外政策风格使日本得以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战略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此外，报告亦明确了美日同盟应优先考虑的三大事项：推进安全同盟、扩大伙伴关系与联盟以及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japan-alliance-2020>

4、《外交事务》刊文分析召开民主峰会的可能性

12月7日，《外交事务》网站发布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亚历山大·维德曼（Alexander Vindman）撰写的文章《美国必须引领“自由世界”：携起手来，民主国家可以抵御威权主义的威胁》。文章认为，特朗普执政时期，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滋长，而许多民主国家的民主进程却陷入倒退之中。对此，文章强调了团结民主世界以对抗日益抬头的威权主义的重要性，并提出召开民主峰会的建议，具体包括以下三点设计：首先，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峰会合作解决日益棘手的国内问题，如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两极分化等，增强民主世界内部的凝聚力；其次，民主国家可以帮助保护彼此免受外部攻击，借助民主峰会在合作解决全球问题上达成一致；最后，峰会应提出一项民主契约，确立参与国的共同目标，并承诺提供制度、技术和资金支持，但拒绝“搭便车”。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2-07/united-states-must-marshal-free-world>

5、《国家利益》刊文分析新冠疫情下的地缘政治

12月5日,《国家利益》杂志官网刊登国家安全记者马克·埃皮斯科波斯(Mark Episkopos)撰写的文章《与新冠疫情斗争中地缘政治》。文章认为,新冠疫苗的科学探索正进入最后阶段,但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竞赛才刚刚开始。俄罗斯宣布的新冠疫苗遭到了西方观察家的一致否定,但中印等俄罗斯伙伴对其表示祝贺,以色列哈达萨医疗中心主任 Zeev Rothstein 认为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担忧源于俄美全球竞争而非科学数据。同时,中国疫苗以及中国国营媒体机构也加入了疫苗接种的信息战。此外,国际主要角色不仅试图直接诋毁对方,还采取措施阻止盟友进口对手的疫苗,如欧盟对匈牙利有限试用俄疫苗的决定表示严厉谴责。文章认为,新冠疫情并没有带来多边主义,而是催化了新一轮大国竞争,疫苗的生产和销售正成为地缘政治的最新“受害者”。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geopolitics-combatting-coronavirus-173824>

6、《外交学人》刊文分析 21 世纪军备控制的前景

12月2日,《外交学人》刊发专栏作家雅各布·帕拉基拉斯(Jacob Parakilas)的署名文章《军备控制能在 21 世纪卷土重来吗》。文章认为,21 世纪的军备控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达成新的军备控制条约是有可能的。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

国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和《伊核协定》，美朝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也未取得实质进展。总体而言，国际军备控制整没有取得突出进展。就算拜登上台也难以扭转这些消极的政策趋势和改变具体的政策行为。另一方面，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增加了军备控制的难度，以进攻型网络武器、自主武器、武装无人机为代表的新型武器构成军备控制的新议题和新领域，但是当前很少有任何书面条约对其进行限制。作者对军备控制的前景持积极态度，认为人类既然能在上世纪 60 年代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就更有可能在基础条件更好的当下达成国际军备控制条约。因此，只要美国愿意认真考虑裁减核武器和推动军备控制，新的军备控制条约完全有可能实现。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2/can-arms-control-make-a-21st-century-comeback/>

7、哈德逊研究所刊文分析 5G 政策的制定

12 月 4 日，哈德逊研究所发布高级研究员亚当·莫索夫（Adam Mossoff）等人撰写的文章《确保 5G 的领导地位》。文章认为，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维持 5G 技术的领先地位对于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此政策制定者对其给予莫大关注。文章指出，围绕 5G 所展开的政策讨论需明确以下两点基本事实：其一，5G 硬件与电信基础设施仅是 5G 复杂技术生态系统众多层次中的一部分，它们既不是唯一组成部分，也不是关涉国家安全唯一重要的部分；其二，依靠简单地计算专利总数来衡量 5G 的发展水平并不可靠，其根本缺陷在于忽

视了专利间的价值差异，即只有一小部分专利涵盖着重要的技术，并可能会低估重大创新成果的价值。如若忽略以上基本事实，将会导致公共政策与私人领域产生问题。在公共政策方面，对他国 5G 技术水平的错误判断将影响一国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同时，对于专利的错误激励将导致专利数据的失真与扭曲，并由此造成国家创新实力被夸大的结果。另外，忽略专利价值间的异质性将对美国创新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将打击企业开发成本较高但更有价值的创新技术的积极性。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547-5-g-technological-leadership>

8、《外交学人》总编：《出口管制法》是中国应对贸易战的新武器

12月4日，《外交学人》刊发该杂志总编辑夏舒（Shannon Tiezzi）的署名文章《中国在贸易战中的新武器：出口管制法》。文章认为，出口管制法的出台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应对贸易问题、以经济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又一重要工具，这有可能重塑中国和世界的贸易关系。该法律规定出口管制适用于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关的军民两用技术、服务和商品。不过，该法尚未公布关键的出口管制清单。这给中国政府在依照该法执行有关行动时，提供了灵活性。中国政府阻止字节跳动出口算法的案例表明，出口管制法的出台和执行确实有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文章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出口管制法》最值得注意的两点是增加了对出口管制措施采取对等反击并规定了域外管辖

权。这些做法是为了应对近年来,美国商务部越来越频繁使用“实体清单”开展对华贸易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2/chinas-new-weapon-in-the-us-trade-war-the-export-control-law/>

9、兰德研究所分析中国 21 世纪的创新倾向

12 月 3 日,兰德研究所发布高级经济学家斯蒂芬·波普尔(Steven W. Popper)、高级政策分析师玛乔丽·布卢门撒尔(Marjory S. Blumenthal)等 6 位研究人员撰写的报告《中国 21 世纪的创新倾向:确定未来成果的指标》。报告为探寻中国的创新倾向及未来成为创新国家的潜力,比较研究了中国在制药、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三个领域的创新案例,对有关中国创新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文献计量分析和专利数据审查进行分析,并选出了 13 个可以反映中国未来创新倾向的指标。报告发现,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制药方面与美国存在差距,但近年来的创新速度在明显加快,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则存在早期优势。此外,中国的创新专利聚焦于政府重点关注的技术领域,而美国的创新专利则主要是由特定的市场所驱动的。报告建议,为预判中国的创新倾向和技术成果,美国应当持续地关注和跟踪中国各个技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并分析影响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利好政策和限制因素,其中包含中国国家体质层面对科技创新带来的影响。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208-1.html

10、CSIS: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影响

12月3日,CSIS发布了研究员杰夫·伯克维茨(Jeff Berkowitz)撰写的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文章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还改变了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投资的热点。2020年风险资本对健康科技、数字转型技术和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资热度上升,而对曾经声名赫赫的金融科技、自动驾驶、太阳能等领域的风险投资则减少了。由于上述投资热点的变化,2020年第二季度(3月至6月)美国风险投资轮数较2019年同期下降44%。虽然2020年春季筹资数量普遍下降,但是总体分配的资金却没有相应减少。在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7亿美元以上的投资流入与新型冠状病毒有直接关联、成熟而风险低的初创科技企业。上述这些趋势意味着,美国经济在后疫情时期,对云技术、健康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需求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

<https://www.csis.org/blogs/technology-policy-blog/covid-19-and-trajectory-us-venture-capital-and-technology-innovation>

撰稿人: 党 森、王宇彤、蔡依航、胡文宸

审稿人: 朱荣生、许馨匀